

袁枚诗论

◆ 石玲著



齊魯書社

◆ 石 玲 著

袁

枚

诗

论

齊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袁枚诗论 / 石玲著. —济南：齐鲁书社，2003.6
ISBN 7-5333-1202-3

I . 袁... II . 石... III . 袁枚 (1716 ~ 1798)
—诗歌—文学评论 IV .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8535 号

袁枚诗论

石玲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E - mail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印 张 9.25

插 页 2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33-1202-3/I·285

定价：22.00 元



序

序

石玲接触袁枚是从她在山东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开始的，学位论文论的是袁枚的诗歌。她获得学位后，在山东师范大学任教，仍然执著地在这个研究课题上继续耕耘，反复解读有关文献，修订、丰富学位论文，不觉过去了五六的时间。当我浏览过这部行将付印的书稿后，不觉为之一喜：比起当初的学位论文又有了显著的提高，论述得更加细致、圆通、深切了。

袁枚是清中叶最富有个性和才情的文学家，近世文史界的学者还推举为伟大的思想家。然而袁枚一生举止言行颇有些超乎常情常理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他诀绝官场，却不耐寂寞，不去做隐逸高士。他尊孔，又疑孔；不佞佛，也不辟佛；攻击程朱理学，要颠覆其“道统”，却又痛恶明代“异端之尤”李贽，称之为“奸猾”、“妖魅”。他尊情重欲，不讳好色，强调“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又将“情”放大到“圣人治天下”之心，为尊情重情找到了神圣的依据。他同情妇女，赞赏女子之才，收了许多女弟子，与旧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相异，却又以尚无子嗣为由，先后娶了数位小妾，而且还喜欢追求美妓，颇为人所诟病。一代旷世才子的袁枚，就是这样



一位思想、行事从常情常理的眼光看难以说他是伟大还是庸俗的人物，只能采用简单的二分法，说他是既伟大，又庸俗。

石玲论述袁枚，虽然偏重在诗作、诗论方面，但视角却触及到了袁枚生平行事和心灵世界的诸多方面。我觉得最可喜之处是没有简单化地将看似矛盾的现象完全割裂开来，褒其美，贬其丑，发扬其精华，批判其糟粕，或者大谈其进步性，结末以难免有其“历史局限”云云了断之。她是就袁枚事迹、作品的实际内容，做出历史的辨析，而且论述得比较贴切，揭示了以往研究者所未曾揭示出的历史内涵，或者是补证了以往研究者已经意识到了但却语焉不详的认识。这里举两个例子。

袁枚抨击程朱理学是顺应了时代的进步思潮，但却又深恶批判程朱理学的先行者何心隐、李贽等人，而他自己的言行何尝不与何心隐、李贽的言行骨子里有很多相似之处，直可以说实为一脉相承。这种现象怎样理解？石玲在《我在故我思：一个思想着的诗人》一节里做了合乎历史逻辑的解释：袁枚对程朱理学的批判是历史前进的要求，而对晚明“狂禅”、“异端”的扬弃，是对晚明兴起的人文思潮的做历史的修正、调整，褒其内核，而弃其偏激，用石玲的话说，“具有一种真与美的趋向”。这种否定之否定，正是包括思想史、文学史在内的一切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读完这一节，我萌生了一种联想：袁枚现象深层底蕴及其表现形态，并不是袁枚所独有的，在清中叶的文学中还程度不同地表现于其他作家身上，表现于诗歌意象和小说人物性格中。这倒是个值得研讨的一个题目。

石玲论袁枚诗歌的历史地位，揭明其从晚明走向近代的过渡意义。前出的评论袁枚诗歌的论著自然已经说到其思想和艺术方面的特征及其渊源、影响，说到具有诗歌解放的历史意义。石玲的论述则更为认真，从诗作的精神内涵、美学特征、题材的平凡、意

象的减少、语言的白话化等多个方面，也就是从诗歌结构的最里层到最外层，全面显示出袁枚诗歌摆脱传统的理念，突破传统的格调、格律，通向现代诗的历史大趋势，把这个中国诗史中一个有意义的课题突显出来了。

我为石玲在袁枚诗歌研究中做出的成绩而高兴，祝愿她继续努力，取得更新的研究成果。

袁世硕

2003年5月31日

序

· 3 ·



目 录

序	袁世硕
绪论	(1)
一、突起于乾嘉时代	(13)
1.“盛世”的社会背景	(13)
2.18世纪的文化生态	(20)
3.乾嘉诗坛格局	(26)
4.突起的异军	(31)
二、读其诗，知其人	(36)
1.出身书香门第	(37)
2.“窭人子”：才子少年贫里过	(40)
3.第一次远行——到广西	(46)
4.北上京师：博学鸿词报罢·中进士·入翰林	(48)
5.外放江南：命运的重大转折	(52)
6.市隐随园：作别纷繁的官场	(54)
7.“青山红粉伴白头”	(58)
(1)一生壮游，得江山之助	(58)



袁枚诗论

目 录

(2)随园先生与女弟子	(60)
(3)放浪不羁的私生活	(62)
三、鲜明的人格特征	(66)
1.“一生心性爱疏狂”	(66)
2.通脱疏俊的天性	(73)
3.富有创造精神	(77)
4.生命中的诗性特质	(80)
5.性格决定命运	(85)
四、我在故我思：一个思想着的诗人	(90)
1.权威死了	(91)
2.个性是生命存在的本然	(99)
3.一生追“随”，任天而动	(102)
4.袁枚思想的历史观照	(106)
五、袁枚诗歌创作概说	(119)
1.一生致力诗歌，作品繁富	(120)
2.众体兼长	(123)
3.天才横逸与“多师为佳”	(128)
六、袁枚诗歌的精神内涵	(139)
1.性情为本的诗歌理念	(139)
2.“著我”：诗歌主体的自我指向	(148)
3.诗作中的哲学意蕴	(158)
4.从崇高到世俗	(160)
七、袁枚诗歌的美学特征	(164)
1.语必惊人总近情	(164)
2.灵动活脱，清新绚丽	(173)
3.万般物是天然好	(179)
4.摇曳多姿的风格和意境	(183)



八、袁枚诗歌中的禅影踪迹	(196)
1. 不佞佛，亦不辟佛	(197)
2. 对佛教禅宗的吸收	(199)
3. 入禅境，亦能出禅境	(211)
九、承递与开启：诗史重要的一环	(215)
1. 过渡：从晚明走向现代	(216)
2. 平视平民	(223)
3. 诗歌题材的平凡	(225)
4. 诗歌意象的减少	(227)
5. 诗歌语言的白话化倾向	(228)
6. 前瞻与认同：与陈独秀等人的历史会合	(233)
十、袁枚诗歌流传及接受述略	(236)
1. 朝廷公卿、市井负贩：接受者的广泛	(236)
2.“随园弟子半天下”：古代诗歌最后的壮丽风景	(240)
3. 二百余年袁枚研究回顾	(242)

附录

1. 论袁枚古体诗创作	(258)
2. 绚丽奇诡 腾踔万千	
——袁枚《同金十一沛恩游栖霞寺望桂林诸山》诗意图论	(270)

主要参考书目与征引文献	(277)
后记	(285)



緒論

袁枚，中国十八世纪最富有创造精神的文学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争议、颇具另类色彩的人物。他在清代乾(隆)嘉(庆)诗坛出尽风头，独领风骚。在当时复古、保守的文化背景下，他的思想观念和文学理念无不带有很强的叛逆性，呈现出鲜明的异端色彩，然而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个杰出的思想者和著名的诗人。而更令人称奇的是，他除在诗坛赢得赫赫声名外，一生竟然都平安无事，这在文网甚密的乾隆时代(袁枚主要生活于乾隆时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袁枚挟着骇人的风雷登上了乾嘉诗坛，他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当年可谓名重一代，正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乾嘉诗人著述之富，声气之横，无过于枚。”（《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第4册，第646页）^①他位居诗坛“乾隆三大家”（袁枚、赵翼、蒋士铨）之首，所谓：“齐名蒋赵首推袁，余子纷纷孰与伦？”^②执诗坛牛耳近五十年。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还将他奉为“及时雨”宋江（《随园铁事》，见《袁枚全集》捌，附录四），由此看来，袁枚在诗坛上的盟主地位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不仅如此，袁枚还以其敏锐的思考和突出的思想成就成为时代个性思潮的标杆。他在思想方面的建树已经引起了当代思想史学者的高度关注，并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笔者非常赞同蔡尚思先生的观点，即认为袁枚是“一位被冷落的大思想家”，如果仅仅将其定位于一个文人、一个文学家，的确是太小看了他，起码是不够全面的^③。尽管如此，我们若从历史上来看，袁枚的显赫声名主要还是来自他在文学上，具体说来是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上的建树。本书探讨的对象，主要就是作为诗人的袁枚。

在有清一代的诗歌发展史上，袁枚与王士禛为前后辉映的两座高峰，清之前半诗人以王士禛为领袖，清之后半诗人则以袁枚的势力为最大，其地位是相当突出的。

不仅如此，袁枚也是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富有个性、富有影响的人物。他的以关注人的存在与人的个性为特征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具有一种历史的进步意义。其“性灵说”在当时得到了不计其数的人的认同，“从游者若鹜若蚁”（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四），追随者云集。

袁枚突起于清代中叶的乾嘉时期，他在考据成风的文化氛围中，在个体差异普遍消解、人们埋头于对古代典籍的训释与模仿之时，异军突起，独树一帜。他的性灵诗说，犹如一股强有力旋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突破了当时诗坛上流行的“格调说”、“肌理说”等的樊篱，冲破了传统诗学理念与时代风尚，对“格调”诗的模拟因袭、“肌理”诗的学问考订、浙派的短钉琐屑，统统予以强有力的冲击，促进了诗歌观念与诗歌创作的解放。以他为首的性灵诗派，是清代最有影响的诗派之一；同时，袁枚以其充满创造精神、洋溢天才之气的诗歌作品，涤荡着清中叶诗坛上的陈腐之气，给诗坛吹来清新的空气。

在清代乾嘉之际的诗坛，袁枚是一个首开风气的人物，他的



突出的历史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诗歌从考据学问的遮蔽中凸现出来。这种努力在乾嘉时代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有清一代，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各种学术，都很发皇，有人说，清代的文化，是以前中国旧文化的总结束，以前所有种种的东西，在那时无一一重现，这句话实在是很确适的。”（胡行之《中国文学史讲话》，第125页）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一方面为人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精神产品，另一方面又让一些读书人钻入其中，不能自拔。于是在文体呈现一种集大成局面的同时，学古拟古成为一种风气，而复古风气盛行的契机，是考据之学的流行。

乾嘉时期，一道夺目的文化风景，便是朴学考据的盛行。在当时，考据之学严重渗透到诗歌创作，人们埋头故纸堆中，关注的是字句的来历、格律上的得失，而失去的是对文学精神的把握。袁枚最大的历史贡献，就在于正本清源，努力找回诗歌失落的本体，找回文学失落的生命力和创造性。

在乾嘉时期考据之风弥漫之时，人们的文学活动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流行风气的浸染。在文学创作上，填书塞典的现象非常普遍。正如袁枚所说的那样：“近见作诗者，全仗糟粕，琐碎零星，……句句加注，是将诗当考据作矣。”（《随园诗话》卷五）写诗如同“古董开店”（同上）。更有甚者，有的人“误把抄书当作诗”（《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七，《仿元遗山论诗》），将诗歌创作与学问考据混为一谈。考据的云雾遮住了人们的视野，文学创作上的寻章摘句、填书塞典壅塞了人们的创造性，诗的精神迷失在字句章法典故之中。对此，我们从当时诗歌、小说、散文、戏曲等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中，均可以寻觅到那个时代的踪迹。

面对乾嘉被考据侵占的诗坛，袁枚痛心疾首，大声疾呼，呼唤



着文学的精神，呼唤着文学失落的主体，呼唤着同文学与生俱来的创造精神，竭力将文学从考据朴学的遮蔽中显现出来。

袁枚认为，“考据之学，离诗最远”（《随园诗话补遗》卷一），“著作与考订两家，鸿沟界限，非亲历不知。……著作如水，自为江海；考据如火，必附柴薪”（《随园诗话》卷六）。诗歌贵独创，考据则重实证。诗歌创作表现人之性情，是对人生与世界独具个性的把握；考据则是一种学术活动，注重对研究对象的客观考察：两者之间如同水与火一样各不相同。袁枚从深层的思维方式上指出了诗歌与考据之间的根本区别：“著作之文形而上，考据之文形而下，各有资性，两者断不能兼。”（《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二十八，《随园随笔序》）。“著作”由于充满创造精神而灵，“考据”则因核实而滞。

袁枚对考据颇不以为然，一方面是对它的斤斤琐细不满，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原因是他认为考据消解创造精神，其致命的不足在于难以自写胸襟，难以自出新意。“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故好丑虽殊，而不同则一也。考史证经，都从故纸堆中得来：我所见之书，人亦能见；我所考之典，人亦能考。虽费尽力气，终是叠床架屋、老生常谈。”（《小仓山房尺牍》卷七，《寄奇方伯》）费尽千力万气，终非自所独创。他所追求的则是“役使万书籍，不汨方寸灵”（《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五，《改诗》）的自我襟怀的充分表现与张扬。

袁枚对以诗歌卖弄学问的做法十分厌恶：“人有满腔书卷，无处张皇，当为考据之学，自成一家。其次，则骈体文，尽可铺排，何必借诗卖弄？”“今之人，欲借此以见博学，竞声名，则误矣！”（《随园诗话》卷五）在当时，诗歌被用来卖弄学问、博取声名，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应该说，袁枚对诗歌创作与考据之学的区分，对翁方纲的“肌



理说”发起了攻击，在当时起到了一种拨乱反正的历史作用。

第二，诗歌表现性情。这一诗学观点，从根本上扭转了清中叶迎合统治者尊儒重道文化政策的所谓雅正的、御用色彩鲜明的、伦理本位的诗风，对沈德潜的“格调说”发起挑战，促进了诗歌由外向内的回归，由道德伦理向自然真实回归，使诗歌回归到表现的本原。

沈德潜是当时袁枚在诗歌领域里最主要的论辩对象。袁枚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见《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中，对其“格调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针对沈氏的复古观点，指出“变”是诗歌发展的必然趋势：

尝谓诗有工拙，而无今古。自葛天氏之歌至今日，皆有工有拙；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即《三百篇》中，颇有未工不必学者，不徒汉、晋、唐、宋也。今人诗有极工极宜学者，亦不徒汉、晋、唐、宋也。……至于性情遭际，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袭之，畏古人而拘之也。

并对其温柔敦厚的诗教进行了大胆的指斥，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

综观当时诗坛形形色色的诗学主张，性灵说是其中最少束缚、最提倡独创、最充分展示自我的文学主张。此说一出，天下靡然从之，竟使其他的诗歌主张偃旗息鼓，溃不成军。郭绍虞先生说得好，“在当时，整个的诗坛上似乎只见他的理论，其他作风，其他主张，都成为他的败鳞残甲”(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566页)。在诗歌表现性灵的观念面前，其他诗说相形见绌，丢盔卸甲，遭到人们的冷落与摒弃。

袁枚所谓的“性情”，指的是人的真挚自然状态中独具个性的情感。显而易见，性灵说摆脱了儒家诗学的伦理功能，认为诗歌既不是考据的附庸或对象，也不是道德说教的工具。袁枚从正面阐



述自己的诗歌观念，这就是著名的“性灵说”。

“性灵说”的主要内涵是“性情”。袁枚认为：“诗者，人之性情也。”(《随园诗话》卷六)“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小仓山房尺牍》卷七，《答何水部》)因此，“性情之外本无诗”(《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六，《寄怀钱玙沙方伯予告归里》)，一言以蔽之，诗歌创作的根本就是表现性情。

第三，袁枚以其真挚、清新、灵动、洒脱的诗歌创作，给清中叶诗坛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

长期以来，学界更多关注的是袁枚的性灵诗说，近些年来情况才有所改观。实际上，袁枚不仅仅是一个卓越的诗论家，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他在清代中叶横空出世，给当时考据成风、平实工稳、温柔敦厚的诗坛带来了一股强大的冲击力。“若夫子才海涵地负，风起云飞，如龙跳天门，如虎卧凤阙，可谓旷世之杰矣。”(顾实·6·《中国文学史大纲》，第308页)他以充满生命活力与天才之气的诗作，独树一帜，掀开清代诗歌发展崭新的一页。

袁枚“诗尤纵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达者，悉为达之”(《光绪杭州府志》一四六)。他自幼酷爱文学，尤其喜爱诗歌创作，“七岁上学解吟哦，垂老灯窗墨尚磨”(《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四，《全集编成自题四绝句》)，致力于诗歌长达六七十年之久，作品数量极为繁富。仅现存《小仓山房诗集》三十七卷、《小仓山房诗集补遗》两卷，就收入袁枚二十一岁至八十二岁六十余年的诗作，计四千四百八十余首。而实际上，袁枚诗歌的数量还远不止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些。

应该说，袁枚的诗歌创作不管是在精神内涵方面，还是在美学追求上，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形成他的既有对人生存在的深入思索，对世间生活的深入表现，又注重文学精神、追求审美情趣的显著特色。



从精神内涵来看，袁枚诗歌表现了明中叶以来的个性意识和自然人性观。袁枚的诗歌创作与他的诗歌观念一样，特别强调以人为本，“天性人为贵”（《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六，《放生所》），“人”是袁枚诗歌表现的核心。因此，袁枚的诗作表现了极有生命个性又真率自然的性情，具有浓郁的主观色彩、沉厚辎重的生命意识。

袁枚的诗歌创作在极力表现自由观念、个性意识、反道统思想，将眼光投向世间生活的同时，也摒弃了晚明文人的放诞俗气，将审美视为诗歌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他从佛禅那里吸取了无相而实相的形而上的思维方式，更强调文学的精神，更注重审美的追求，将世俗的现实生活升华，表现出更为浓重的文学色彩。

我们认为，袁枚诗歌的价值与意义，不在于它为我们反映出多少清中叶的社会面貌和状况，而在于它是一部心灵的信史，一种自觉意义上的自我展露。这其中既包括诗人的情感体验、诗人对生存价值与意义的思考与叩问，也包括诗人对人生方式的自觉选择，等等。这样的内容使得袁枚诗歌的内涵显得格外厚重。

同时，袁枚诗作灵动活脱，腾跃着生命的活力：“提笔学化工，一味活泼泼。”（《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一，《遣怀杂诗》）这与当时诗坛的“褒衣大裾气象”（袁枚《与沈大宗伯论诗书》，《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大相径庭。邱炜夔《五百石洞天挥麈》云：“随园先生《小仓山房诗集》能言古人所未言，能达今人所欲言，是以语妙当时，而传后世。其不满于书庸亦以此。要知先生胸罗万卷，下笔有神，自兼众妙。今观集中典实诸题，一片灵光，流走贯注。若在他人为之，当不知如何使力矜词，死气满纸矣。”（《袁枚全集》捌，附录三）对袁枚诗的出色表现力及“流走贯注”的灵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袁枚的诗作一如他的诗论，注重表现性情。正如其女弟子金纤纤所言，“余读袁公诗，取《左传》三字以蔽之，曰：‘必以情’。”



(见《随园诗话补遗》卷十)主情色彩非常突出。

袁枚诗歌创作风格多姿多采，奇峰怪鄂，倚地拔天，杜鹃红艳，春兰幽蓄，争奇斗妍，令人目不暇接。这正是作者自觉追求“忽正忽奇，忽庄忽俳，忽沉骜忽纵逸”(《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二十八，《赵云崧瓯北集序》)多种艺术风格的结果。他的诗作有的深沉蕴藉，有的空灵透脱，有的汪洋恣肆，……呈现出诗歌大家的风范，独具美学特征。

从表现形式上来看，袁枚的诗歌创作众体皆备。袁枚自己对此也颇为自负：“仆诗兼众体，而下笔标新，似可代雄。”(《小仓山房文集》卷十八，《答程鱼门》)蒋士铨“古今只此笔数枝，怪哉公以一手持”(《读随园诗题辞》，见《小仓山房诗集》卷首)的称誉，也是从众体皆备的意义上来讲的。

由于受传统观点的影响，袁枚的古体诗长期以来相对地受到
· 8 ·
忽略。实际上，忽略了袁枚的古体诗创作，就不能对他的整个诗歌作出较为全面与准确的评判，从而会导致袁枚诗歌评价的片面和不足。我们应突破前人樊篱，全面把握袁枚诗歌创作，尽可能为其作出全面、深入、准确的阐释与评价。

袁枚自己也认为，“凡人全集，各有精神，必通观之，方可定去取；倘据摭一二，并非其人应选之诗，管蠡窥测”，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见《随园诗话》卷十四)。这番话虽然是针对当时的选诗而言的，但对我们今天评价袁枚的诗歌同样适用。袁枚生前坚决反对以考据式的支离破碎的思维方式来看待诗歌、对待文学。因此，我们只有认真解读袁枚的全部诗作，仔细挖掘其精神内涵，认真探讨其创作特征，才能对其作出较为符合实际情况的判断。

第四，袁枚在清中叶诗坛的突出贡献还在于开创了声势浩大的性灵诗派。性灵诗派是清代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性灵文学思潮是中国文学在跨进近代门槛之前的一次文学革新思潮和文学